



IACM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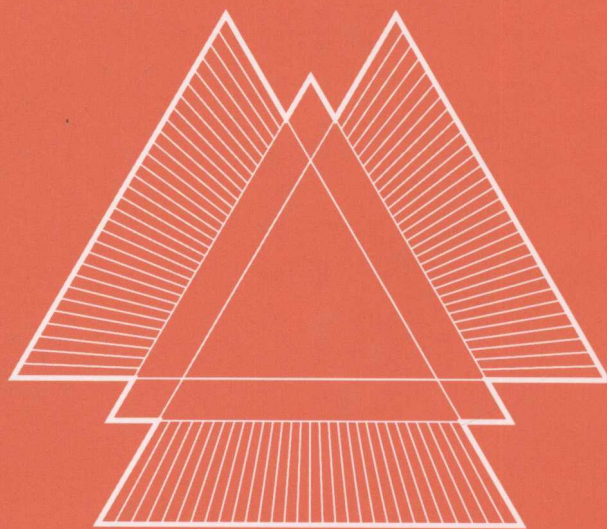
组织与管理书系  
丛书主编：徐淑英

# 自下而上的变革

##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美〕倪志伟 (Victor Nee) 〔德〕欧索菲 (Sonja Opper) 著

阎海峰 尤树洋 译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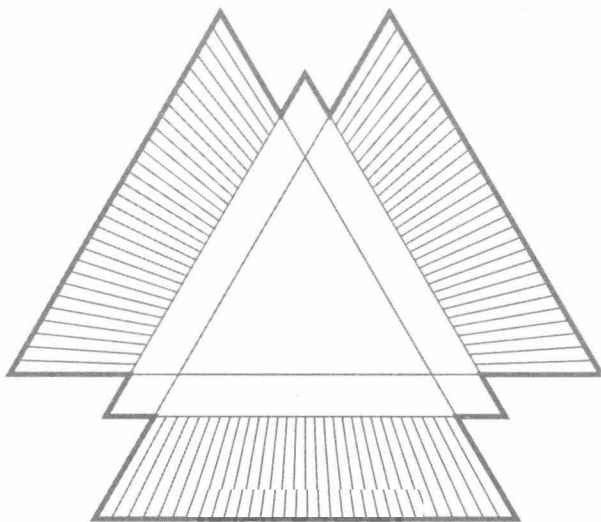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自下而上的变革

##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美〕倪志伟 (Victor Nee) 〔德〕欧索菲 (Sonja Opper) 著

阎海峰 尤树洋 译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665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 (美) 倪志伟 (Victor Nee), (德) 欧索菲 (Sonja Opper) 著; 阎海峰, 尤树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7

(IACMR组织与管理书系)

ISBN 978-7-301-27155-1

I. ①自… II. ①倪… ②欧… ③阎… ④尤…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810 号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by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r

Copyright © 201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ZIXIAERSHANG DE BIANGE
著作责任者	[美] 倪志伟 (Victor Nee) [德] 欧索菲 (Sonja Opper) 著 阎海峰 尤树洋 译
策划编辑	徐 冰
责任编辑	黄炜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15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88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7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译者序

## PREFACE

尽管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还是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令世人震惊的经济奇迹：它不仅让超过 6.3 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还令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伴随这一人类历史上罕有经济奇迹的，还有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在旧体制的重重阻碍面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克服了各种障碍，从初始的星星之火发展为后来的燎原之势，并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发动机”？这一问题可称为“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多年来，这一谜团吸引了全球相当数量、不同学科学者的目光，人们不断地尝试着从各自视角予以解答。

本书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倪志伟（Victor Nee）教授和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学系欧索菲（Sonja Opper）教授合著，堪称目前众多尝试的扛鼎之作。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鲍威尔（Walter Powell）所言，这既是一本“充满新观点和重要洞见”的“非常精彩的著作”，也是一本“显然应该受到多个学科欢迎的鸿篇巨制”。本书不仅融合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各种理论，包含着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在内的各类实证数据，还融合了历史、产业分析、社群分析和比较区域分析等多种方法，以及数以百计的访谈，“工程浩大，完美呈现”（鲍威尔语）。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称赞说，本书不仅“内容丰富、令人瞩目”，而且其可读性也非常强。它讲述的是在一个转型经济体，“当个体被容许在夹缝中追求自身利益时，作为这一追求过程的副产品——一个富有效力的经济制度——是如何兴起的。”伯特断言，“本书将具有长久的参考意义。”

这项历时六年（2005—2011年）的研究对长江三角洲地区超过700家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调查，两位作者发现：中国的民营经济是从底层的民间生长、发育、成长起来的。在这个由微及著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国的“草根”企业家们冒着各类风险，不断试错，在传统经济体制的夹缝中进行着各种类型的制度创新，使得他们得以从已有的经济秩序中脱离出来，建立和发展起小型的民营制造企业。此间，为了克服各种进入壁垒的限制，他们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供应商和经销商网络，并通过由声誉和非正式制裁主导的合作性网络的运行，在自组织的产业集群中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机制，最终发展形成令人不可小觑的民营经济竞争优势。正是这些在创业方面志趣相投的人们，相互提供融资和建立商业规范，逐步汇集和形成了紧密的群体，共同促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壮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作者发现，这些快速成长的民营经济群体在沿海地区迅速扩散，并且经由一系列的引爆点，在遍布国有企业的市场夹缝中发展壮大起来。

本书从多个不同的理论视角，运用统计数据、调查数据及案例访谈等多种证据来源，详尽地分析市场、创业者、产业集群、劳动力市场、创新机制等，揭示了在政府政策等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由社会底层创业者自发地发展出的规范和网络，如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作者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奇迹，揭开了他们所发现的中国经济奇迹的谜底：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创造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奇迹。也就是说，底层创业者在夹缝市场中不间断的冒险性尝试和创新性行动，特别是非正式的制度创新，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就业岗位，同时也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最终在正式制度层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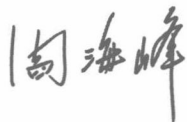
正如华盛顿大学和悉尼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利维 (Margret Levi) 所说的, 上述结论挑战了有关以国家为中心的正式制度是经济绩效和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观点, 为其他传统制度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案例提供了新的解释。

上述国际著名学者对本书的赞誉应足以帮助读者掂量其分量, 译者再说恐怕就有续貂之嫌了。况且, 尽管译者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原著, 但我们都不是社会学学者, 对本书精髓的领悟和把握有限。所以, 这里就不再赘言, 一切留待读者自赏、自鉴。

我们接下这样一桩不甚讨好但甚费力的活, 用元稹的话说, 大抵是“半缘修道半缘君”。“半缘修道”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自是将这项工作视为学习的绝好机会; 第二层含义则是为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IACMR) 做义工。学会创立至今, 泽被广大, 我们也是受惠者, 理应回报。此书获 IACMR 创会主席徐淑英教授力荐, 承蒙托付, 自然不能懈怠, 此即为“半缘君”。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阎海峰主持, 东北财经大学尤树洋博士翻译了第 1、4、5、6、10 章,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周海波翻译了第 2 章和部分注释, 王启虎翻译了第 3 章和附件中的调查问卷, 硕士生雷勉和李桐翻译了第 7 章, 秦一琼老师翻译了第 8 章, 李桐和李雨蒙翻译了第 9 章, 李桐还翻译了部分注释。阎海峰对全部译稿进行了审校。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听闻是为 IACMR 做义工, 没有任何推辞且竭尽全力, 力求“卓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黄炜婷老师, 以严谨扎实的咬文嚼字之功, 为本译著增色不少。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不负所托, 更令读者满意。如有问题, 责任当由主持者承担。



于 2016 年 6 月 1 日

# 致谢

## ACKNOWLEDGEMENTS

探索、解释引发新经济秩序的制度变革是一件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事情，本书报告的这项为期六年（2005—2011年）的研究结果，目标恰恰在此。这项贡献来自一个多方构成的国际化研究团队的努力，我们为此而欠下的“知识债”既深且广，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这些年来为本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戴维·苏、卢汉龙和其他研究人员，在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建议。如果没有 Sun Bocheng 及其市场调查研究所（Market Survey Research Institute）全体同仁的付出和努力，我们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调研将无法完成。我们的中国同事史晋川、林毅夫、袁岳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为本项目提供了主要的研究资金。我们特别感谢 Barnaby Marsh，他对本项目的帮助始终如一；我们还要感谢瑞典研究理事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利乐公司，以及克拉福德基金会（Crafoord Foundation）对本项研究的资金支持。

我们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Michael Aronson 在每个阶段的支持和对原稿的编辑输入，以及 Rachel Davis 对原稿的出色编辑，使得我们的观

点更加清晰；同样也要感谢制作编辑 Barbara Goodhouse。

我们衷心感谢担任本研究助理的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们的帮助，他们是：Yujun Wang、Ningxi Zhang、Zun Tang、Christopher Yenkey、Li Ma、Mark Jacobs 及 Paul Lee。

许多同事都通读了原稿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和批评，做出这些贡献的同事有：William Parish、Michael Macy、Walter Powell、Benjamin Cornwell、Lisa Keister 及 Frank Young。一些学者对原稿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有益建议，他们是：Howard Aldrich、Fredrik Andersson、Wm.Theodore de Bary、Matthew Bothner、Susan Buck-Morss、Ronald Burt、Franco Cerase、Robert Ellickson、Joseph Galaskiewicz、Christer Gunnarsson、Ravi Ramamurti、Eric Siggia、Iván Széleányi 及 Markus Taube。Glenn Carroll、Michael Hannan、Douglas Heckathorn、Håkan Holm、Jesper Sørensen、David Strang、Richard Swedberg、Anne Tsui 和 Rafael Wittek 在本研究的不同阶段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欧索菲感谢隆德大学经济系的大力支持，后者在关键阶段给予了一年（2009年）的免教，以支持其研究及写作。她也感谢在隆德大学（2010年）、康奈尔大学（2007年和2011年）、复旦大学（2007年和2011年）、杜伊斯堡—埃森大学（2008年和2010年）、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2009年）、特里尔大学（2008年）举办的研讨会上生动且有价值的讨论。此外，她对来自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年会（2011年）、隆德大学举办的内生制度变迁会议（2011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年会（2010年）、美国管理学会年会（2008年），以及欧洲经济学会年会（2008年）上参会者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多年来，学生们源源不断地提出了各种反馈意见；更重要的是，隆德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生课程上的学生最先听闻了我们的观点，并参与讨论了本书的一些关键思想。最后，朋友和家人也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欧索菲特别感谢 Björn Meyer 许多富有成效的讨论、对原稿中部分内容的高屋建瓴的评论，以及他的坚定支持和鼓励。



倪志伟感谢 Brett de Bary 不倦的关心和支持，及其自始至终所给予的反馈。在中国的浙江省、上海及南京，她和制片人 Safaa Fathy 加入我们当中，拍摄和记录了现场访谈与企业考察。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奖助金（2007—2008年）和学术休假（2008—2009年）为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与时间。本研究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2011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2011年）、哈佛商学院（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康奈尔大学（2010年）、清华大学（2010年）、班贝克大学（2009年）、社会研究新学院（200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9年）及复旦大学（2008年）做报告后收获了有益的评论。倪志伟还感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举办的“1989年：后20年”会议（2009年）、巴黎大学在佛罗伦萨主办的“制造业市场”研讨会（2009年），以及意大利社会学协会在撒丁岛举办的经济社会学家会议（2009年）上报告本研究的过程中，那些提出探究性问题和评论的学者。

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为整个项目提供了智力与行政支持。每周的经济与社会实验室会议参与者为本书的基本观点提供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论坛。在主题报告会上，康奈尔大学的一些研究生阅读了初稿并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本书的第2章和第9章分别借鉴了已经发表的文章。我们感谢出版者许可我们改编和使用下列受版权保护文章中的部分内容：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and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49-74; 以及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n, “Political Capital in a Market Economy,” *Social Forces* 88(2010): 2105—2135。

# 目录

## CONTENTS

- 01 经济体制从何而来 / 001
  - 国家重塑经济体制 / 003
  - 国家中心论的局限性 / 004
  - 经济制度内生性的产生机制 / 007
  - 本书结构安排 / 009
  
- 02 市场和内生制度变革 / 011
  - 社会规范的作用 / 012
  - 本书框架 / 015
  - 维系社会规范 / 018
  - 社会规范和制度变革 / 020
  - 自下而上的民营资本 / 028
  - 结 论 / 033
  
- 03 自下而上的民营经济中心 / 035
  - 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区位和经济地理 / 040
  - 长三角地区企业家和企业调查 / 044
  - 样 本 / 054

调查设计 / 056

补充调查 / 058

结 论 / 059

#### 04 创业者与制度创新 / 061

创业行为的自我构建过程 / 064

从农民到企业家 / 067

企业家格外能够承担风险吗 / 070

合作的社会规范 / 073

企业的资金运作 / 084

结 论 / 094

#### 05 合法性与组织变革 / 097

作为制度变革机制的同构化 / 101

组织结构的神话和现实 / 107

内部结构如何适应变化的制度环境 / 112

结 论 / 117

#### 06 产业集群及其竞争优势 / 119

产业集群的社会结构 / 122

规范服从和冲突处理 / 131

民营经济的自主性 / 137

大舞台上的竞争优势 / 143

结 论 / 146

- 07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 149
- 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 152
  - 工人与工作匹配 / 155
  - 就业条件的趋同化 / 163
  - 人力资源政策 / 174
  - 结 论 / 181
- 08 创新的机制 / 183
- 创新的社会结构 / 187
  - 民营经济和主流经济的比较 / 207
  - 结 论 / 209
- 09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213
- 适应中的国家 / 214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 / 219
  - 制度背景下的政治资本 / 220
  - 政治资本能否解释经济上的成功 / 232
  - 国家的视角 / 237
  - 结 论 / 240
- 10 总 论 / 243

## 附录1 企业调查 / 249

2006年企业调查总经理（所有者或职业经理）访谈问卷 / 249

2006年企业调查首席财务官访谈问卷 / 272

2009年企业调查总经理（所有者或职业经理）访谈问卷 / 279

2009年企业调查首席财务官访谈问卷 / 308

## 附录2 访谈名单 / 315

注释汇览 / 319

参考文献 / 365

## 经济体制从何而来

中国民营经济的出现和稳步增长，出乎政治家们的预期。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初动机，实际上是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框架内完善中央计划经济。政治家们支持改革政策，是为了刺激和提高被连年经济滞后压垮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力。随着持续强调公有体制，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无疑是一项在不幸的政治动荡年代过后，巩固和稳定国有经济体制的浩大工程。与其他转型经济中激进和彻底的变革方式相比，中国的改革似乎过于保守，它致力于恢复原有的体制而非创造性的革新。然而，与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带来了繁荣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会在中国出现呢？创业者是如何突破由政府施加的强大市场进入障碍？在仍然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中，是什么制度允许民营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市场经济体制从何而来？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为解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路径，给出一个既有的答案。

在推动党的改革政策中，中央政府通过分权和减少国家对经济行为的控制方式来增强动力。在农业领域，改革者通过土地租赁制，将产品分散到个

体农民的手中，推动了农村市场渐进式的自由化进程。在工业方面，通过保留企业利润和给予企业更高的自由度，改革措施加强了对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物质激励。与此同时，国家推进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以缓解资本限制并加速国家的技术追赶进程。通过收入共享方式，改革的领导者推行财政放权，以加强对省级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尽管低一层级政府有义务向上级政府按照一个固定比例上缴财政收入，但是它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保留一部分盈余。<sup>1</sup>

在东欧和苏联，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代表各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学家们齐聚在首都所在城市，向新政府的政治家们提出关于如何设计和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议。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政治家们公布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资本市场的正式规则与政策。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强调快速和大规模的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和货币改革，其背后的逻辑建立在中央计划体制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的假设之上。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只有通过激进式改革，才能打破中央计划体制强有力和根深蒂固的利益及其对几乎所有领域的支配，进而迅速地构建出一个合法性框架作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sup>2</sup>他们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注定会失败；而东欧和苏联大胆的改革措施，会通过快速转型为其建立起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尽管人口数量在增长，以现价计算的中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 30 多倍。从改革初期名义人均 GDP 150 美元——那时世界排名第 131，到 2010 年，中国以人均 GDP 4 603 美元跻身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sup>3</sup> 社会和经济福利效应也很显著。自经济改革开始到 2009 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5 年，为 73 岁，甚至都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sup>4</sup> 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下降后，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快速上升。即便如此，经济改革还是使所有人受益。<sup>5</sup> 1981—2005 年，按每天 1.25 美元的消费标准计算，超过 6.3 亿的中国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行列，使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81.6% 降至 10.4%，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摆脱贫困的纪录。<sup>6</sup>

民营制造经济的兴起对财富创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且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整体面貌。截至 2009 年，国内生产的工业总产值中，仅 20% 左右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创造的，41% 来自以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形式注册的民营企业，25% 来自混合所有制的有限责任公司，13% 来自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sup>7</sup> 民营企业创造了 40% 的产业利润，并且承担了 47% 的由国内资本投入的劳动就业。<sup>8</sup>

被认为旨在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改革，在促进市场导向的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面，为什么要比采用激进式改革、严格遵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议的东欧与苏联更有效呢？在改革初期处于如此不利地位的民营经济，为什么在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得以蓬勃发展呢？

## 国家重塑经济体制

许多观察者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四十多年成功市场转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用政府援助、地方政府的社团主义还是发展型国家来刻画这个观点，总是含有一个潜在的观念：在创造和形成用以保障与激励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方面，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sup>9</sup> 一般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过程，政治精英们创造了提升效率的规则和政策。<sup>10</sup> 尽管经济改革的试错性特征被广泛认可，但是对中国市场转型成功和失败的分析与解释，仍然聚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家们身上。很多研究描述了地方政府官员是如何运用治理手段和财政权力，并通过加大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或者建立地方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的方式，成功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sup>11</sup> 即使是对适应性制度变革的区域分析中，也鲜有强调创业者和企业的主动性作用，而主要突出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包括弥补国家层面的立法缺失，制定临时性政策以保护民营企业不被地方政府征用。例如，温州作为浙江省的一个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前的工



业基础薄弱，作为对当地商业行为的响应，在1987年就实施了地方性的民营企业政策，这比中央政府发布第一份官方的民营企业治理文件早了一年。<sup>12</sup>同时，温州的地方官员还制定了简化税收体系等地方性政策，引导和促进创业行为。温州或其他区域的地方性政策形成了“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这表明，这些地方政府的默认态度通常起到了支持性的作用：尽管在这些地方缺乏保护私有产权的正式制度，但处于边缘地位的民营经济仍然可以快速成长。<sup>13</sup>

以政治团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经济绩效主要来源”的观点为基础，国家中心论的研究强调了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作用。<sup>14</sup>“政治家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观点既是在实际上不可否认的，也是从直觉上让人感兴趣的。凭借着使用合法强制手段的专权，国家享有制度变革的实质性成本优势；相反，为了建立和实施游戏规则而发起的集体行动会产生成本，而“搭便车”问题限制了经济活动参与者承担这些成本的能力。政治家们从税收中求得最大化的利益，这驱使他们提供公共物品以获得税收；反过来，这又与他们发起的正式制度变革——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益相一致。<sup>15</sup>

在这种观点下，要脱离中央计划体制，自然要先将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制度化，因为政治团体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正式规则。而非正式的制度不但变化得慢，而且是政治精英们力所不及的。<sup>16</sup>这些非正式制度，被认为与政治家们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目的相反。<sup>17</sup>

## 国家中心论的局限性

然而，国家中心论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能解释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如何出现并不断增强的，直至今成为中国制造业经济的核心部分。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尽管中央政府是鼓励家庭作坊（个体户）的，但还是明显地限制私人性质的商业行为，使之成为边缘性角色。就民营企业合法化的政策而言，政府抱着容忍的态度，做出必要性的让步：允许社会的边缘性团体——农村的个体户，无业的、失业的和退休的工人——进行小规模的生